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坚赞才旦 许韶明◎著

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
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坚赞才旦 许韶明◎著

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
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 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 许韶明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1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8 - 7

I. ①青… II. ①坚… ②许… III. ①青藏高原—婚姻问题—研究
②青藏高原—土地问题—研究 IV. ①D669.1 ②F3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86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周建华 钟永源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钟永源 陈 霞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6.5 印张 54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淑婷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①，“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25°~38°、东经90°~104°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②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③，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氏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士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艽”——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000米的荒野，愈往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界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甘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民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流，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骠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①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中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颇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人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②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①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骠国的描述。

^②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天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①,肯定J. 马肯齐、J. 布特勒、G. W. 贝雷斯福德、A. F. 查特尔特、P. C. 巴利、B. C. 戈海尔、M. D. 普格^②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 M. 贝利、F. K. 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 N. S. 古塔、马骏达、N. 罗伊、B. C. 古哈和S. 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① 参见(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②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③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①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②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骥、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③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④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①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②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7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傣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①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17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1996年夏天至今，他已11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①，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10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1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4个课题资助，10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①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4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年）、“川青滇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①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换的重要作用。

^①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自序

经历了十余年的田野工作，交替着短暂的文献收集和持续的写作，为着追求取材丰富、立论沉稳的目标而反复磨砺，今天终于迎来本书脱稿的佳期。

虽然之前我们在不同的民族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七八篇调查报告、论文和译文，但这部书绝非“旧瓶装新酒”，将刊登过的文章拿来加点新材料，而是另起炉灶、从头做起，把全部材料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面，分门别类，提炼问题，凝聚论点，考虑叙述的思路。因此，本书利用的素材和文献，引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题目打算阐发的深度和广度，在国内外同类研究中虽不敢说居于前列，但也决不能说仅达交差的水平而已。

这本书是两位作者前后默默耕耘了17年的劳动结晶。在研究的肇始阶段，我们的起步先后有别，对这个题目的发凡各有因缘。远因虽然各异，近缘却基本相同，那就是好奇心、专业熏陶与时运的机缘凑巧。凡读过一些文化人类学原著的人，大约都知道兄弟共妻制的比例之低仅次于姊妹共夫制。它在地球上是的那么的罕见，却在青藏高原屡见不鲜。此外，兄弟共妻这一婚制结构复杂，其所依赖的自然与社会条件独特，故150年来持续引起一些文人学者的高度关注。作为民族学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之一就是対异文化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与寻常人的猎奇心态截然不同。科学始于兴趣，原创来自上下求索。这种好奇心给予我们的感情带来频繁的碰撞，引导着我们的思想步步深入。

我之所以选择婚姻家庭做研究，首先是受黄淑娉先生的影响。黄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人类学的核心，仅从民俗学角度去分析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她身体力行，对国内外民族的婚姻家庭都有研究。我从先生那里学到做学问的基本态度。其次，我之所以选择西藏，更重要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影响。杨成志教授的研究对象全是少数民族。他说：“我认为在中国搞人类学，非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此话表明了研究的重点，也暗示了研究的方法：相对于汉族社会而言，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都比较简单明了，要认清汉族社会的诸种复杂关系，最好先研究简单社会。不可否认，由于我和许韶明的师生关系，我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传染了他，起到先行后续的引导作用。

说到远因，就本人而论，已很朦胧，讲起来别人可能会觉得渺茫。但总比讲不出来要好一些。思虑再三，还得归功于文学的点拨。记得20世纪50年代有一部名叫《我们播种爱情》的小说，60年代有一部叫《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前者以一个农业技术推广站为引导，叙述了一群汉藏人士的劳作，牵出不甘心失败的敌对势力，汉族青年与藏族姑娘的邂逅等，加上雪山、帐篷、牛羊，寺庙、民族语言和服饰的点缀，推出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我从中得知了一种叫做兄弟共妻的婚俗。后者以一位女毕业生进藏途中的思想波动为主线，叙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平凡哲理。两部作品被绘制成连环画，鼓励小朋友志在四方，长大后到边疆去。我是深受影响者之一。现在反省起来，尽可说它们是模式化创作，故弄玄虚，着墨偏颇，民族味道淡薄，可是还得承认它们为小学生展开幻想的天地，引起有益的遐想，我便是受益者之一，很早就产生了想见识藏族风俗习惯的冲动。

30年后的一个夏季，我实现了少年时代的理想。当时京港有两个机构的合作项目启动，朋友推荐我到西藏山南地区做问卷调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任务以后，没有什么紧要事可做，我想顺便做一次摸底调查，就这样来到了杰德秀镇，住进一户藏人家，尽力打听各种情况。当这家人的儿子带领我走进一条偏僻的山谷，我看见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些兄弟共妻的家庭，就像地质队员发现矿脉一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打定主意，这次先做一次普通调查，将来再回来深入调研。待返回来时，已是三年之后。翌年秋天我又去了一次。

做任何研究都要清楚前人的成就与覆辙，舍此则无从扬长避短。屈指算来，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从进入外界视野到实证研究，可追溯到300年前，再回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个阶段可称为实证研究前期，又分为两个亚期：

荟萃直观材料

1716年，意大利修士德西德里抵拉萨，到色拉寺学佛，1721年因蒙古军队进藏而离开，他回到罗马叙述了西藏的经历，包括兄弟共妻等风俗，带动了一些外国旅行家、探险家和传教士来西藏。直到20世纪初，进藏的外来人员络绎不绝，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录。此外，大清驻藏的百名臣子、赵尔丰的随军人员，民国的驻藏官员也写下一些旅途轶闻。它们有的成为当时学者立论的依据，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就用过几则。殊不知记录者未经专业训练，所录之事多凭主观印象，以至道听途说，一厢情愿地猜测，很多是靠不住的，即使有真实的成分，大多一鳞半爪，不足于形成立论的根据。

尝试性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学者疏散到西南、西北边疆，少数人沿康藏边境

旅行，运用古典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沿途观感。与此同时，英国、印度学者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南的山区调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 世纪末，迎来了兄弟共妻制的实证研究时期，可细分为两个亚期：

(1) 用科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收集材料。1945—1969 年，英国、美国、印度学者在印藏边境调研，国内学者在、川、青、滇、藏调研，收集到一些兄弟共妻制的材料，由于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各自的材料无法汇总，中外学者亦无法共享资料。外国学者把获得的资料与他们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同类研究作对比，取得瞩目的成果。国内的调查材料放在抽屉里，无人问津，更没有及时撰文发表。

(2) 继续调研时期。1970—1999 年，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一些论著，但各有不足，国外的研究水平虽然较高，但由于不能进藏，只能到毗邻西藏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做调查，或者是调查外逃的西藏难民，材料不够全面，限制了成果的科学性。国内到 80 年代中期，民族学研究才转入正轨，在消化旧材料的基础上做一些新调查，写出了几篇文章，但基本上是对某个村落或社区的孤证式研究，未将各个调查点上的资料汇总到面上分析，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

在这条长达 3 世纪的轨迹上，尤其是最近 1 个世纪，研究者的积重难返已是公开的秘密。本人无意渲染，只从客观的角度一一道来，好让读者拭目以待，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的局限，又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脱离窠臼。

说到局限，首推国外学者，他们长期被隔绝于国门之外，鲜有人获准入境做田野调查。这种条件下很难说他们的感性认识全面而真实。他们倒是西藏境外行多偶婚的族群做过实证研究，想出许多理论预设，创立了许多模块，归纳出一些诱人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去消化。但它们能否生搬套用到青藏高原，尚须尝试，并在运用中加以修正或改良。

国内学者受到的局限主要来自时代，先是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继而是政治运动，组织体制、评价机制等方面也存在消极的影响。虽然研究者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最终还是在种种影响之下难以平心静气地调查研究。他们有时受领导意志的主宰，参与“包饺子”或“打歼灭战”，有时因领导对业务无暇过问而放任自流，混日子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是做田野研究，也难做到扎实、缜密。例如，某科研机构长期未做田野工作，突然组织三巴（珞巴、门巴和僜巴）调查，虽然取得第一手材料，并未达到预期，出版成果时挪用了别人的照片也不注明。此外，时兴学俄语，懂英语的人少，而俄文刊物基本不发相关文章，研究婚姻的英国、美国、印度人士居多，国内很少看到他们的论著，缺乏跨文化比较的材料。加之单线进化论、单因素论（强调经济基础，忽视上层建筑）的思维模式占上风，给文化人类学简单地贴上阶级标签，导

致分析的利器不足，虽有一些真实的田野材料，难以深入解释。至于藏族聚居区某些地方受到“左”的政策干扰，兄弟共妻制遭到破坏，调查者不容易看到原生态的东西，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说，国内外对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的研究均远未达到理想水平。21世纪以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但外国学者仍然缺少进藏调查的机会，原有的不利仍旧是他们的弱项，国内学者开始走向农牧区获取感性材料，提高英语能力，接触世界其他民族的婚俗材料，学习国外同行调查、分析、解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逐渐抛弃简单化的做法，如把法律当理论，将兄弟共妻制置于对立面，冠以陋俗的名称等。

科学研究犹如田径场上的接力赛。时代赋予我们新的研究平台，前人受到的某些局限已不复存在，以往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田野研究的艰苦依然存在，中外学者不畏困难、扎实缜密的作风尤其值得学习。

我们不是婚姻研究专家，当产生一念之差去承揽这个题目的时候，说实话，对兄弟共妻制有兴趣而无能力，为什么竟“胆大包天”走上了研究之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想得太多，毕竟新生事物都是从幼小开始壮大的。从来就没有天生的“专家”。只须下定决心，不辞劳苦，诚如郑板桥所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总有一天会在这个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搞人类学研究必须做田野调查，即使搞学术史，至少也要做一次系统的田野调查，否则怎能理解“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道理。然而，不少文章甚至于论著都带有“理论多而材料少”的弊端，与“论从史出”相悖。此处把“史”理解成亲自调查获得的材料和利用别人发表的调查材料，似乎也未尝不可。为了克服“以论代史”的毛病，我们不仅要在材料和观点的比例上要前者压倒后者，而且在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的比例上也要步调一致。正所谓“务求新，必求真”，故多做田野调查研究是必要的。本书坚持用民族志的体裁来写，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靠得住的材料，让事实说话、理论才好衬托。为了知晓同行的研究，学习先进，克服落后，多读文献也是很重要的。总之，做好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两方面的工作，才能深入分析，形成预设，并检验或修正之。

2001年秋，我利用访学的机会向外界报告了江雄河谷的研究进展，介绍了调查员很少看到兄弟共妻家庭的暴力现象，甚至很少看到丈夫间故意寻事、挑毛病、强烈口角的现象，如果说，兄弟共妻制不会引起丈夫间的嫉妒是说不过去的，问题在于藏族文化中存在着某种机制，嫉妒在萌芽状态或者刚产生，还来不及扩大就受到风俗习惯的限制和疏导而消除了，不会影响社会内部的团结，因此，藏族人的价值观中肯定存在同质的因素，它们遏制了个性的发展，同时形成强大的社会内聚力来杜绝违反社会常规的行为。

听众中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同行，他也介绍了自己在安第斯山区做调查时碰到的类似婚俗，讨论者认为不排除两地（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环境相似的因素。那年冬天，我还跟凯斯·西方储备大学（CWRU）的戈尔斯坦教授通过几封电子邮件，得知他辅导了一篇研究西藏兄弟共妻制复兴的博士论文。本书导论第四部分的一个脚注（见第16页）已经指出，直到2012年7月，这篇论文的中译本才面世，国内读者可领略里面的丰采。

我在国外加紧收集英文资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后来证明这些资料很有价值。2004年，许韶明加盟这项研究，并在本人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我们俩的调查把重点从雅鲁藏布江流域转移到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研究上，坚持“在参与观察中收集材料并增加感悟，用理论模型指导整个研究过程，以跨文化比较来延伸认识，从结构功能的视角凝聚与剖析现象”的原则；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坚持翻译，走“教学、科研、翻译”三结合的道路。

我们力图在三个层次寻求效果：宏观上把握全局，考虑在世界婚姻总量中一妻多夫制的比例和集中分布的区域，确定青藏高原兄弟共妻制的地位；中观上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三江并流区域选取若干调查点，开展多样本的研究，由点到面地形成认识；微观上以系统论的方式彰显兄弟共妻制的结构性事件，厘清各种要素构成的合力，推动着人们适应自然与社会。我们希望对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形成一个概貌性的认识。

最后迎来了写作阶段。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差不多时，如何使用这些来之不易的资料？每个写过文章的人都有经验，通常用两种途径来解决：一是拟定写作提纲，三四层楼（章、节、目、点），反复修改，使之结构合理、逻辑顺畅，然后边写边割取材料，犹如砌墙建房，拉好基准线，立好门窗框架，双手协调动作，一边加泥灰沙浆，一边添砖加瓦。这种做法必须资料相当充分。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行的，就算是田野调查做了十几年，文献上广泛地扒梳剔抉，材料仍然没有余地。联系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讲过“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①的话，就是要以材料为出发点，先整理出来，再反复看，边看边琢磨，尽可能地熟悉，达到融会贯通，继而提炼问题，并把问题按逻辑归类，再来确定提纲并动手写作。有时候，即使材料较多，但由于别人有较多的论述，也可以少写或不写，这样的提纲并不是很匀称的，会有厚此薄彼的现象，但正是论著所需要的，因为文章最怕的就是一刀切。

这样做等于带着问题去探索，但不失为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既可以为研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1页。

究积累动力，又可以为研究提供指引。下面试举我们所碰到问题的一小部分：

兄弟共妻制究竟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还是对传统生产方式的适应？它究竟是围绕社会分层体系而存在（换言之，仅仅是贫穷人家行此婚俗呢，还是也有富裕人家践行）？还是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社会地位而分布？封建农奴制对兄弟共妻制起到什么作用？实行这一婚制只是对家庭本身有益呢，还是对整个社区有益？兄弟共妻制控制人口的秘密在哪里？在节制人口方面，是丈夫牺牲大，还是妻子，或者是过剩的妇女及其孩子？藏传佛教在加重过剩妇女数量的结果时，有没有消化她们的机制？多偶婚家庭（兄弟共妻或姊妹共夫）和单偶婚家庭有没有各自独立的亲属称谓系统？如果没有，他们的亲属关系怎么称呼？在一个流行兄弟共妻制的社区，怎么测定妇女的地位？兄弟共妻制家庭的运作模式如何？兄弟共妻婚的传播模式如何？兄弟共妻制有无独特的婚仪？兄弟共妻制家庭的生命周期如何？兄弟共妻制的类别与形式如何？兄弟共妻制家庭的财产继承模式如何？性关系在婚姻与家庭中的地位与作用怎么样？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怎么样？西藏的兄弟共妻制和印度的多妻多夫制是什么关系？婚姻与家庭之外的性关系补充机制何在？兄弟共妻制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怎么样？社会舆论对兄弟共妻制家庭的评价如何？兄弟共妻制的动力学模式如何？

上述问题作为写作时的坐标，既是我们把握对象的一道道环节，也是对这一婚制感兴趣的人们容易碰到的，或者说这些问题会启发他们的思考，我们的尝试性回答提供了参考性的答案，尽管人们各自忙于生计，垂注这一珍稀婚姻形态的人日渐稀少，包括猎奇者，但是，只要他们专注于此，肯定会问题连连，深掘类似的题目依然大有可为。

本书是一场毅力的较量，我们行走在凹凸不平小径上，小心翼翼地接受研究对象的考验。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说我们真诚地热爱藏文化，决意宣扬汉藏民族的理解和友谊，此乃研究的动机和写作的动力，那么努力做好这件事就是我们的责任，也就追求到自身价值的体现和自身做人的尊严。科学要讲真话，放箭须对准靶心。写书的过程犹如弓弩手寻找远方的目标，随时准备张弓搭箭。书既已写成，就像满月弓送出流星箭，随着箭铃声的远去，能够射到多少环，最好让书本身来说话，作者用不着再画蛇添足，纠缠不休了。是为序。

坚赞才旦

2013年9月9日

于中山大学大榕树寒舍

绪 言

青藏高原东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相交的地区，涵盖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级行政区，是多条江河的发源与流经地，自古为重要的民族走廊。

我国西南边疆的某些民族——如藏、门巴、珞巴、夏尔巴^①、纳西、普米、独龙等——主要行一夫一妻制的单偶婚，其中也有不少人行兄弟共妻或姊妹共夫式的多偶婚。婚姻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相连，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基本形式。研究任何一种婚制，把握它的形成、维持、分解和效用，不仅是自身理解的必要，也是认识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入口。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凡是劳力不足、资源匮乏、风习单纯的村落，均可见兄弟共妻、姊妹共夫和一夫一妻三位一体的现象，但比例有所不同。假设婚姻总量为百分之百，三种婚制，一夫一妻婚比例最高，兄弟共妻婚次之，姊妹共夫婚较为罕见。根据对贡嘎、江达、左贡、芒康和德钦5县20多个村庄的调查，三者之比约为92%:7.5%:0.5%，衬出当地民族的婚姻选择和走势。

任何婚制都要依托家庭（family），甚至于家户（household）。这两个概念很重要，家庭存在于家户中，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家名”的户头，二者为包含或包含于关系。联姻规则必然突破家庭而涉及家户。由此观之，兄弟共妻制是一个地方的人们长期选择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一块凸显的区域，清代以宁静山^②等处划界，界桩以东

^① “夏尔巴”或“舍尔巴”，英文都写为 sherpa。他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两麓，南麓散居于多吉岭等地，有七八万人，其中一些人聚居在珠峰附近与西藏接壤的昆布—索卢地区。过去我国民族学界习惯把北麓西藏境内的称为“夏尔巴人”，而称南麓为“舍尔巴人”，实际上是同一个群体。

^② 光绪二十二年（1898）十二月，清廷会同川、滇、藏三方官员在宁静山、邦木塘（巴塘）、达拉寺（今贡觉县敏都乡过拉山的更庆寺）等处勘界，以明确辖区，防止孳生边界纠纷，此举为收回雍正四年（1726）布施给达赖的香火地、清廷势力西扩的表现。